关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的几个问题

王　皓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宋代外交文献,通常认为其作者是徐兢;但实际作者当不止徐兢一人,部分内容曾有奉使同僚参与创作。另外,此书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鸡林志》的批评和模仿,在绘画闻见时有只图其异、不图其陋的标准。

关键词: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创作背景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6(2012)01-0130-07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四十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宋代外交文献。作者徐兢(1091—1153),字明叔,号自信居士,曾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身份随使高丽。作为一份外交实录,《高丽图经》向来被中、朝双方所重视。在中国,不但历代目录典籍多有著录,传抄与刊刻还确保了其文字在今天的流传;在朝鲜半岛,则先后被收入《朝鲜群书大系》、《朝鲜学丛书》、《韩国学古典系列》、《朝鲜国译丛书》等大型丛书。故学术界围绕其版本流传、史料价值等方面讨论尤多,而事关此书创作层面的问题却少有论及。为此,本文将针对《高丽图经》文本创作的几个问题稍作辨析,略陈管见。

一　被遗漏的《高丽图经》作者

历代目录典籍,如《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均著录《高丽图经》的作者是徐兢,当今学术界对此也普遍认同。但笔者以为《高丽图经》的创作,并非仅得力于徐兢一人,而是有奉使同僚的参与和帮助。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载有一段书名叫《高丽录》、内容为谈论潮汐的文字,文献表述称"徐明叔、传墨卿《高丽录》云"[1]127。按:徐明叔,即徐兢也;"传墨卿",当为傅墨卿之误,因"传"繁体"傳"与"傅"字形相近所致。《会稽志》卷一五载:"傅墨卿字国华,山阴人。……墨卿比凡三至高丽,初为书状官,中为副,最后为使。"[2]可见徐、傅二人均有奉使高丽的经历,并在宣和五年成为奉使同僚,当时路允迪、傅墨卿分别充正、副使职,徐兢为从属。

所引《高丽录》内容与《高丽图经·海道》序论中段相同,又据南宋耐得翁《就日录》引《云麓漫钞》时称"徐明叔等《高丽录》云"[3]552,这说明宋人很清楚《高丽图经》的某些内容是由徐兢等人合撰而成,至少可以明确"海道"部分有傅墨卿参与其中。当然这个《高丽录》不一定就对等于《高丽图经》,今《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五六、《广百川学海乙集》都收录有徐兢《使高丽录》一书,未条其目,内容相同于《高丽图经·海道》"招宝山"至"礼成港"条,这是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从明州出发,六月十三日到朝鲜开城;七月十三日返回,七月二十七日抵明州定海县的海程日记。从现存引文来看,《高丽录》与《使高丽录》的内容并不相同,但是二书共同指向了《高丽图经》的

收稿日期:2011-10-31
作者简介:王皓(1983—),男,彝族,四川泸定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海道”部分。今本《高丽图经·海道》下共设置条目四十六个，依次是：

> 神舟、客舟、招宝山、虎头山、沈家门、梅岑、海驴焦、蓬莱山、半洋焦、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夹界山、五屿、排岛、白山、黑山、月屿、闌山岛、白衣岛、跪苫、春草苫、槟榔焦、菩萨苫、竹岛、苦苫苫、群山岛、横屿、紫云苫、富用山、洪州山、鸦子苫、马岛、九头山、唐人岛、双女焦、大青屿、和尚岛、牛心屿、聂公屿、小青屿、紫燕岛、急水门、蛤窟、分水岭、礼成港。

与《使高丽录》相比多出“神舟”、“客舟”两条；那段谈论潮汐的《高丽录》引文，则是在“神舟”之前的序论中。如此看来，二书难道是从《高丽图经·海道》中节录出来的吗？其实不然。据徐兢《高丽图经》自序所称：“谨因耳目所及，博采众说，简去其同于中国者，而取其异焉。凡三百余条，厘为四十卷。物图其形，事为之说，名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谨掇其大概，为之序云。”[4]8 又注作序时间是“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可知《高丽图经》是成书于使还的第二年，并经过徐兢“简去其同于中国者，而取其异”，“三百余条，厘为四十卷”的整理加工。由此可以推测，徐兢、傅墨卿合撰的《高丽录》，和内容没有条目的《使高丽录》可能都是未经整理的原始版本。对此，徐兢侄徐藏写于乾道三年夏至日的跋文可供旁证，云：

> 仲父既以书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春，里人徐周宾借观未归而寇至，失书所在。后十年，家君漕江西，弭节于洪，仲父来省，或谓郡有北医上宜生实获此书，亟访之。其无恙者特《海道》二卷耳。仲父尝为藏言：“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余追画之，无难也。”然不果就。嘻，盖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澄江郡斋，来者尚有考焉。[4]8-9

这段话的大意是：《高丽图经》成书后在辗转传抄中内容逐渐流失，如徐兢自述“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故徐藏所得并非完本，“无恙者特《海道》二卷”；虽然徐兢曾有追画补缺的打算，可惜未能如愿，最终被徐藏付梓的依旧是缺图残本。问题在于为什么《高丽图经》在经过一段时间流传后唯独“海道”部分完好无损？它与《高丽录》、《使高丽录》所存录的“海道”内容又有怎样的关系？回答以上问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即徐藏称所得“无恙者特《海道》二卷”，但据徐兢所整理的《高丽图经》四十卷，“海道”部分实为六卷。这就是说，“《海道》二卷”不是出自《高丽图经·海道》，而很有可能与《高丽录》、《使高丽录》同源，是《高丽图经》成书前的一个“海道”单传本。

《高丽图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既有文字、又有图画的外交作品。早在唐代外交中，这一创作模式就得以广泛运用。例如：唐高宗显庆三年，“以西域尽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因命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5]6425；又，王玄策出使印度，有《中天竺国行记》和《中天竺国图》两种记录，二者同指一书，《历代名画记》称其“行记十卷，图三卷”[6]82；又，唐文宗时，遣田牟出使吐蕃，“大和八年四月，进《宣索入蕃行记图》一轴，并图经八卷”[5]6426。这些都指明了文字与图画的密切关系。时至宋代，图记作品依然时兴于外交中，除《高丽图经》外，相关记录还有沈括使辽，“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7]10655；沈括自序云：“山川之夷险、远近、卑高、横从之殊，道途之陟降、纡屈、南北之变，风俗、车服、名秩、政刑、兵民、货食、都邑、音译，觇察变故之详，集上之。外别为《图抄》二卷，转相补发，以备行人。”[8]218 宋球“再使高丽，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使还，图纪上之，神宗称善，进通事舍人”[7]11064；张叔夜使辽“还，图其山川、城郭、服器、仪范为五篇，上之”[7]11140；毕仲衍使契丹“时预其元会，尽能记其朝仪节奏，图画归献”[7]9523。“图记”显然成为使臣记录外交过往的一种特殊体裁，其功能如徐兢所述，可以使“一人之尊，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4]7，故外交图记在创作完成后大都会进献朝廷。

同时，在宋代外交使臣中还流行着另一种纪行体裁——日记，以记录奉使每日行程见闻为主要内容，有：北宋时期的路振《乘轺录》、刘涣《刘氏西行录》、张舜民《使辽录》；南宋时期的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辔录》、姚宪《乾道奉使录》、韩元吉《朔行日记》、周辉《北辕录》、程卓《使金录》、邹伸之《使北日录》、徐霆《北征日记》、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等。《高丽图经·海道》文字正如周辉在《清波杂志》中介绍《刘氏西行录》是“往返系日以书”[9]426，张舜民《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自叙其《使辽录》是“排日纪录”[10]49，以及《郡斋读书志》称《揽辔录》是“往返地理日记”[11]1131，《直斋书录解题》称《乾道奉使录》是“使金日记”[12]205 的使高丽往返海程日记。

此外,宋代还有另一种具有日记形式的外交体裁——语录,主要记录外交双方来往的语言,尤其是奉使语录,皆系日记录使途经过和话语。这一外交文体在宋代使臣中创作极为普遍,可以说是每次遣使必有的"官样文章"[13]4。目前能考知的有:寇瑊《生辰国信语录》、富弼《奉使语录》、余靖《庆历正旦国信语录》、刘敞《使北语录》、欧阳修《北使语录》、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陆佃《使辽语录》、林摅《北朝国信语录》、章谊《章忠恪奉使金国语录》、魏良臣《奉使语录》等。如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完整记录了奉使的三个阶段:一是从五月十日雄州白沟驿记起,至六月十三日到辽主驻地神恩泊,共33日;二是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辽主驻地活动,共8日;三是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九日回程到雄州,共28日[14]2541-2545。

因此,将《高丽图经》与外交日记、奉使语录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宋代以日记形式创作外交作品的风气影响下,其"海道"部分是完全满足独立成书的条件的。但独立成书目的是什么呢?徐兢在《高丽图经》序文中谈到成周时期,"行人之官,骆驿道路。若贺庆禨禬之类,凡五物之故,莫不有治;若康乐厄贫之类,凡五物之辨,莫不有书。用以复命于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4]7。他认为,《高丽图经》有类于周代行人的复王命书。的确,这一传统在中国历代外交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宋代使臣就极负责任感,在没有任何制度规定下,创作了诸多关于奉使行程、见闻的作品进献朝廷。例如:

> (路振)奉使契丹,其间撰《乘轺录》以献。[7]13062
>
> (晁迥)使契丹,还,奏《北庭记》。[7]10086
>
> (王云)从使高丽,撰《鸡林志》以进。[7]11229

不过,可以让统治者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外交过往的莫过于用日记形式创作的作品。起于使行,终于使回,内容全部在奉使过程中完成,无需任何修缮,回来即可上奏。正如宋代制度规定遣使必作的外交语录一样,《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蔡絛《北征纪实》载蔡京等使辽,"及使回,未至国门,国信所语录先上,神宗皇帝读之大喜,且谓得使人体"[15]8144。使臣尚未还至国门,奉使语录却已经通过相关机构呈交了皇帝,这显然是对统治者急切想了解外交情形的一种反映。由此可以推断《高丽图经》"海道"独立成书的合理性在于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就是说,徐兢一行人使回,便将使行日记以《高丽录》或《使高丽录》作书名进奏了朝廷。至于《高丽图经》,可能是因进奏日记的缘故,使皇帝得知徐兢在奉使过程中多有绘画记录,于是"有诏上之御府"[4]8、"诏给札上之"[4]158,所以徐兢才去其同、取其异,条其目、厘其卷,成书于第二年。这里需作补充的是,由于除外交语录外,其余如外交行程记、日记、笔记等作品都不受制度约束,所以使臣有灵活选择是否创作此类作品的权利,也有决定进奏朝廷与否的自由,这样必然导致一些作品散藏于民间。如张舜民《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云:

> 出疆往来,经涉彼土,尝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记录,因著为《甲戌使辽录》。其始以备私居、宾友燕言之助,今偶尘圣选,辞不免行,因检括旧牍,此书尚在。其间所载山川、井邑、道路、风俗,至于主客之语言,龙庭之礼数,亦可以备清闲之览观。并《长城赋》一篇,涉猎古今,兼之风戒,谨缮写成册,副以缣幞,随状进呈。[10]49

可知张舜民创作《使辽录》的初衷并非为了上奏朝廷,即便是投札进呈,在他眼中其书也不过是可供娱乐闲观而已。由是可以印证《高丽图经》完全存在应诏成书的可能。

所以,当《高丽图经》成书进奏后,那篇曾写着不止徐兢一人创作的使高丽日记便成为此书的一部分。徐兢自然成为人所共知的作者,而那些间接为《高丽图经》着过墨的奉使同僚却湮没无闻了。事实上,在外交日记、语录等作品创作中,合撰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尽管文献著录外交作品的作者以正副使居多,但也不乏随使撰写的实例,如王云、楼钥、彭大雅为书状(一称书记)官,分别撰有《鸡林志》、《北行日录》、《黑鞑事略》;钟邦直、雍希稷为礼物官,分别撰有《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隆兴奉使审议录》;严光大为日记官,撰有《祈请使行程记》。从使团构成来看,人员配备是相当完整的,例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节仗》"上节"条载:

> 都辖、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合门宣赞舍人吴德林,提辖、朝奉大夫徐兢,法箓道官、太虚大夫、蕊珠殿校籍黄大中,碧虚郎、凝神殿校籍陈应常,书状官、宣教郎滕茂实、崔嗣道,随船都巡检吴敞,指使兼巡检路允升、路逵、傅叔承、许兴文,管句舟船王觉民、黄处仁、葛成仲、舒绍弼、贾垣,语录指使刘昭庆、武阳明,医官李安仁、郝

洙，书状使臣马俊明、李公亮，引接荆珣、孙嗣兴。[4]95

又如《祈请使行程记》载：

祈请使：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参政刘岊、枢密文天祥、参政家铉翁，奉表献玺纳土官：监察御史杨应奎、大宗丞赵若秀，日记官：宗丞赵时镇、阁赞严光大，书状官：御带高州太守徐用礼、潮州通判吴庆月、惠州通判朱仁举、处州通判沈庚会、浙东路钤吴嘉兴，掌管礼物官：通事总管高举、总管吴顺，提举礼物官：环卫总管潘应时、总管吴椿、环卫总管刘玉信，掌仪官：浙东路钤詹囿、带行官属五十四员、随行人从二百四十人、扛抬礼物将兵三千人。[16]卷八，193－195

可见，书状官、礼物官等使职一般都由多人充当，以及单次遣使就派遣语录指使三人、日记官两人的记录，充分说明外交日记等作品的创作是具有集体性的。

另外，再从相关文献表述来看，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载宋镐等使交阯还，“上令条列山川形势及桓事迹，镐等自叙云尔”[15]699。《宋史·交阯传》亦载：“上令条列山川形势及桓事迹以闻，镐等具奏曰……”[7]14061－140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载：“宋抟等使契丹还，言……。”[15]15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载：“宋绶等使还，上契丹风俗，云……。”[15]2253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二“论北朝政事大略”云：“臣等近奏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国信使，寻已具语录进呈讫。”[17]748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载：“又据（陈）轩等语录云：……”[18]997用到“宋镐等”、“宋抟等”、“宋绶等”、“臣等”、“轩等”之类的称谓，所表达的明显不是个体概念，而是群体概念。但是这些只能说明部分使臣日记、语录等外交作品存在集体创作的事实，而不能由此判定所有作品都是合撰的结晶。不过，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在《高丽图经》成书之前，的确有一份经使团成员参与完成的海程日记已先行呈交了朝廷。所以，即使徐兢被定名为《高丽图经》的作者，但在清人王士祯眼中，著作权也不应只属于他一人，如其所述：“宋使路允廸、徐兢著《高丽图经》，载富轼世家，又图其形以归。”[19]

二　《高丽图经》与《鸡林志》的关系

《鸡林志》作者王云，字子飞。《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诏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往使高丽[7]14049，王云为书记官从使，使还，撰《鸡林志》以进[7]11229。《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目录均著录为三十卷，是书已佚。徐兢在《高丽图经》序言中论及《鸡林志》，云：

臣尝观崇宁中王云所撰《鸡林志》，始疏其说，而未图其形。比者使行，取以稽考，为补已多。[4]8

可见，徐兢在使高丽前曾参阅过《鸡林志》，并对其“始疏其说，而未图其形”的缺陷表示不满，于是，《高丽图经》便以“物图其形，事为之说”作为创作宗旨。这表明徐兢之书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有弥补《鸡林志》不足的创作动机。

其实在外交中有一种前使之书、后使参阅的习惯，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使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宋代的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自叙云：“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20]卷四，31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自序是书可以“转相补发，以备行人”。又有《宋史·范坦传》载范坦，“使于辽，复命，具语录以献。徽宗览而善之，付鸿胪，令后奉使者视为式”[7]9680。《宋会要辑稿》载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十八日，“臣寮言：‘遣使金国，往来所有得语言率皆大事，往往先照不相照知，酬应之间，不无差舛，此为非便。每遇使回，有所受事，不载语录，诚为阙典。欲自今后奉使回程，各具所得之语，实具札子闻奏，降付三省、密院编录成册，不许泄漏。遇遣使命，则令通知前后事宜。如此则其知首尾，应答之间无失词之患，可以专对。’从之”[21]3098下。前两则是使臣自述其行程记录有助于后之行人，后两则是统治者将前使语录整理供后使参阅，这些都说明前使的作品、经验等对后使有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毫无疑问，徐兢正是在这一风气下得以目睹王云《鸡林志》，并对其《高丽图经》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诚如周辉《清波杂志》卷七所说：“宣和奉使高丽，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9]323这明确指出《高丽图经》是模仿《鸡林志》而成。

可惜《鸡林志》早已不传，目前只能凭借相关典籍的著录，以及数条佚文粗知其大概。诸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攟辑其会见之礼，聘问之辞，类分为八门。”[11]29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自元丰创通高丽以后事实，皆详载之。”[12]204王应麟《玉海

·异域图书》云:“其类有八,自高丽事类至海东备检。”[22]305上 周辉《清波杂志》云:“《鸡林志》四十卷,并载国信所行遣案牍,颇伤冗长。”[9]324 吴炯撰《五总志》云:“王子飞从国信之高丽,撰《鸡林志》,天启以诗赠行云:‘闻君秉笔赋鸡林,海怪山奇入购寻。莫纪大宛多善马,却令天子便甘心。’非特句法之端重,而虑高识明,绝人远甚。”[23]13 由是可知,《鸡林志》共分为八类,有“高丽事类”、“海东备检”等门目,内容包括“会见之礼”、“聘问之辞”、“海怪山奇”等。因此,从形式上看,徐兢仿照《鸡林志》采用分门别类的编排方式,将《高丽图经》分成二十九门,列异闻三百余条;至于内容,徐兢则是对王云“始疏其说,而未图其形”的不足,进行“物图其形,事为之说”的补充。

按:今考《说郛》(宛委山堂本)卷六〇上收有《鸡林志》一书,阙撰人名,共录佚文八条;《辽史拾遗》引录王云《鸡林志》五条,与《说郛》本中五条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二与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二九各注引《鸡林志》一条;高似孙《剡录》卷七与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各引《鸡林志》一条,但未注明作者。共计《鸡林志》现存佚文十条,存疑两条。

现将《高丽图经》与《鸡林志》佚文中所记条目相似的内容对比如表一:

表一

王云《鸡林志》[24]277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僧衲	高丽僧衣磨纳者,为禅法师衲甚精好。	释氏	详细记录了国师、三重和尚、阿阇梨大德、沙弥比丘、在家和尚这几类僧侣的服饰。①
织席	高丽人多织席,有龙须席、藤席。今舶人贩至者,皆席草织之,狭而密紧,上亦有一小团花。	文席	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于床榻,粗者用以藉地。织草性柔,折屈不损,黑白二色,间错成文,青紫为襈,初无定制。
松扇	高丽松扇,揭松肤柔软者缉成,文如棕心,亦染红间之,或言水柳皮也。	松扇	松扇取松之柔条,细削成缕,搥压成线,而后织成。上有花文,不减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遗使者最工。

从表一可见徐兢所记内容的确要比王云更为详细,充分展示了“始疏其说”与“事为之说”的不同。同时可以发现在外交使臣之间、作品之间是有一定传承关系的,这既是一种政治需求,也是一种创作需要。如此无疑让使臣成为了接受和传播外交作品的一条必要途径,大家默守着前使之书、后使发扬的习惯,使创作外交作品的传统得以代代沿袭。

三 《高丽图经》图画刍议

徐兢之所以要批评王云《鸡林志》未图其形,而自炫《高丽图经》物图其形,是因为他擅长书画,宋高宗称“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25]4;张孝伯称其“画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绝”[4]160。适逢高丽使入贡,“请于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4]158,徐兢便以书画之才当选。诚如周辉《清波杂志》称《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

尽管徐兢“自序尤拳拳于所绘之图”[26]631上,但图画的流失却是出乎意料的迅速。据周辉《清波杂志》所说:“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9]323-324 短短数十年时间,图画尽皆遗失。徐兢也自言“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余追画之,无难也”,但最终还是将图亡经存的遗憾留存至今。

《高丽图经》的图画创作究竟如何?真如徐兢自序“建国立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使不逃乎绘画纪次之列”[4]8吗?对此可以从“事为之说”的文字中探知一二。如表二、表三。

表二

建国	
世次	
城邑	今尽得其建国之形势而图之云。
门阙	
宫殿	今绘其形制,仍不废其名也。
冠服	然而官名参差,朝衣燕服,时有同异者,谨列之,作冠服图。
人物	今姑自李资谦而下,图其形者五人,并其族望而为之说。
仪物	今并绘其仪物如后。
仗卫	今绘图各以名色列之于后。
兵器	今具其名物,图之于左。
旗帜	今并列于图云。
车马	
官府	
祠宇	今取其人使道路所历,与夫斋祠游览耳目所及者图之,其余不见制度,则略而不载。
道教	

释氏	今图其衣服制度，以考同异云。
民庶	今绘其国民庶，而以进士冠于篇。
妇人	今姑摭其异于中国者图之。
皂隶	今自吏职以迄驱使，并列图于左。
杂俗	今姑总其耳目所见者图之，并以土产资养之物附于后。
节仗	
受诏	今图其趋事执礼之勤，以备观考。
燕礼	具载于图，以志其向慕中国之意。
馆舍	其建立使馆，制度华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馆舍图。
供张	今谨叙丽人所以祗待使华者，作供张图。
器皿	谨掇其概图之。
舟楫	今谨即所见列于图。
海道	今既论潮候之大概详于前，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
同文	谨条其正朔、儒学、乐律、度量之同乎中国者，作同文记而省其绘画云。

表三

城邑	国城条	总其建国大概而图之，其余则互见于别篇。
宫殿	王府条	析而图之，或互见于诸篇也。
仪物	羽扇条	其形上方，今当图其完形，如初制而未久者，庶可考也。
兵器	行鼓条	金铙之形，与中华制度不异，故略而不图。
祠宇	王城内外诸寺条	凡此者，以其屋宇隘陋且多，故略其图而载其名焉。

注：表二、表三文字均录自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从二表可以看出，建国、世次、门阙、车马、官府、道教、节仗七门与其余门类的区别在于，缺少明确记录有“图画”字样的经文，这说明徐兢所施之图绘可能不包含所有门类，因为徐兢对《高丽图经》所录三百余条是否都图之以形，是具有一定标准的。

一是图其异。如“妇人”门云：“今姑摭其异于中国者图之。”又如“同文”门云：“且图志之作，所以纪异国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则丹青之作何事乎赘疣？”这一标准也是徐兢撰写图经的基本出发点，其自序云：“谨因耳目所及，博采众说，简去其同于中国者，而取其异焉。”[4]8 所以，当遇到与中国相同的制度、事物，但又有记录的需要时，徐兢的办法是“略而不图”、独记以文。如“同文”门云：“谨条其正朔、儒学、乐律、度量之同乎中国者，作同文记而省其绘画云”；又如“兵器”门“行鼓”条云：“金铙之形，与中华制度不异，故略而不图”。如此，依据图异标准则可以反推经文没有“图画”字样的七门中，至少“车马”门是有图绘的，云：“然其土地湫隘，道途跷确，非中华比，故輈轮之制，辔驭之法，亦异云。”[4]59 所以，从文字对比来看，这七门都有记录缺失，没有明确标示出“图”或“略”。这为判断七门是否有图造成了一定难度，但是徐兢的图异标准是必然成立的。

二是不图其陋。如“祠宇”门“王城内外诸寺”条云：“凡此者，以其屋宇隘陋且多，故略其图而载其名焉。”据此便能知道“门阙”门不言图绘的原因是“高丽门阙之制，亦颇遵古侯礼，虽其屡聘上国，亦颇效颦学步，然材乏工拙，终以朴陋”[4]24。

由于徐兢有上述两个图画标准，故而《高丽图经》记有三百余事，并不意味着就绘有三百余幅图形。也就是说，“图”和“经”作为《高丽图经》的两个组成部分，是有不对等的情况存在的。之所以会出现不对等的情况，或者说是只记以文、不图其形的情况，则是因为所见之事物或与中国相同，或形制简陋，不足以用图来表现。

相较而言，《高丽图经》是宋代外交作品中卷帙最大的一部，集中了外交作品创作的多种表现形式，有日记、笔记、图绘等。如此丰富的创作，是深受政治环境、外交传统等方面影响的结果。所以《高丽图经》的相关创作原则启示我们：外交行记、语录等作品，作为特殊的外交文体，大都有着丰富的创作背景，了解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批文献的生存环境。

注释：

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一八记载国师：“皆服山水衲、袈裟、长袖偏衫、金跋遮那，下有紫裳、乌革钤履。”三重和尚：“服紫黄贴相、福田袈裟、长袖偏衫，下亦紫裳。”阿阇梨大德：“服短袖偏衫、坏色挂衣、五条，下有黄裳。”沙弥比丘：“未经受具，坏色布衣，亦无贴相。戒律既高，方易紫服；次第迁升，乃有衲衣。盖高丽僧衣，唯以磨衲为最重耳。”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纻窄衣，束腰皂帛，徒跣以行，间有穿履者。”

参考文献:

[1]赵彦卫.云麓漫钞[M].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2]施宿,等.会稽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陆楫,等.古今说海[M].成都:巴蜀书社,1988.
[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虞云国,孙旭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9]清波杂志校注[M].周辉撰.刘永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张舜民.画墁集[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郡斋读书志校证[M].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傅乐焕.辽使丛考[C].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金毓绂.辽海丛书[M].沈阳:辽沈书社,1985.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刘一清.钱塘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18]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王士祯.居易录[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王明清.挥麈前录[M].上海:上海书店,2001.
[21]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2]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7.
[23]吴坰述.五总志[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陶宗仪.说郛[G].宛委山堂本//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5]宋高宗.翰墨志[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On the Several Problems of the Creation of *Xuan He Feng Shi Gao Li Tu Jing*

WANG 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Xuan He Feng Shi Gao Li Tu Jing* is a illustrated foreign literature book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Xu Jing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its author. But actually the author should be more than one person, because some contents of this book are written by other colleagues.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of this book is complicated, for example, the motive is based on the criticisms and the imitate of the *Ji Lin Zhi*, and the standard is to only paint the difference and ignore the short compared to China when it was created.

Key words: Xu Jing; *Xuan He Feng Shi Gao Li Tu Jing*; creation background

[责任编辑:唐　普]